

论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时代价值

王巧荣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2488;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 北京 100009

作者简介: 王巧荣, 法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共国际战略思想与实践研究”(21BDJ019)。

[摘要] 毛泽东外交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和建设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相结合及建立反帝反霸国际统一战线等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本内容。独立自主、和平共处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 为新时代中国外交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准确把握国际国内局势, 客观认识国家利益, 坚持外交服务大局是毛泽东外交思想实践留下的宝贵经验。

[关键词] 毛泽东; 独立自主; 和平共处; 反帝反霸; 新时代

[中图分类号] A8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0209(2023)06-0049-09

毛泽东外交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对外交往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的, 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国际战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更是对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中历史经验的概括与总结。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主要内容包括独立自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帝反霸国际统一战线等。它为新中国外交思想的确立、外交政策的制定奠定了理论基础, 为新时代新征程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留下了宝贵经验。

一、毛泽东外交思想形成的背景

毛泽东外交思想形成有着深刻的历史、现实背景, 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近代以来中国外交理念与实践经验教训是毛泽东外交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 二战后国际局势变幻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对外工作经验是其形成的现实背景,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际战略观是其形成的理论基础。

(一) 历史背景

鸦片战争爆发后, 在西方殖民者“炮舰外交”的轰击下, 清政府腐败无能、步步退让, 给国家生存和发展利益带来极大伤害。“据不完全统计, 从 1840 年鸦片战争起到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止, 西方列强强迫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共达 1175 件。”^①西方列强通过这些苛刻的不平等条约, 在中华大地上攫取了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许多重要特权。中国的领土、领海、司法、关税等主权遭到严重侵犯。中国从历史上的泱泱大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主权独立受到严重侵蚀, 领土遭到西方列强的瓜分。中国在近代史上长期遭受的苦难和屈辱, 使中国人民对涉及国家主权、民族尊严的外交问题相当敏感, 无比重视国家“独立自主”的地位。“弱国无外交”的历史, 给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留下了刻骨铭心的历史记忆。

(二) 现实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改变了国际格局, 欧洲作为世界中心的时代结束, 国际格局呈现出两极对峙的特征。二战期间, 英、法与德、意欧洲四强作为交战双方, 各自国内的经济、社会都受到极大的

^① 王泰平:《新中国外交 50 年》(上),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年, 第 4 页。

创伤。与此同时,横跨欧亚两洲的苏联在战争中上升为一流大国。美国综合实力大幅度增强,成为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随着日本战败投降,战时结成的反法西斯同盟赖以存在的基础不复存在,美英与苏联之间的矛盾日趋表面化。1947年3月,“杜鲁门主义”的出台,拉开了美国与苏联冷战对峙的序幕。1949年8月,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条约组织(简称“北约”)正式成立。此后,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通过签订一系列双边、多边协定也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20世纪40年代末,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阵营对峙局面业已形成。新中国成立时,正值美苏两大阵营的对峙从欧洲向全球扩展之际,这势必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新中国的外交抉择产生直接影响。

与此同时,亚非地区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二战为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英法等列强在亚洲、非洲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力量得到快速发展。日益高涨的民族解放运动浪潮汹涌澎湃地冲击着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与霸权政策,特别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亚非国家人民反帝反殖的决心和信心。中国与亚非国家相似的历史命运,以及新中国与亚非新独立国家面临着相似的现实任务,使他们在心理上存在着朴素的亲近感。这对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形成产生了相当重要的影响。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革命斗争时期,在与共产国际、美、苏等国际组织和政府的交往与合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中国共产党凭借强烈的独立自主意识,逐渐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最终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而与美苏交往的实践经验对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此外,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中国人民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探索与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有深刻的教训。外交是内政的延伸,这些经验与教训也极大地影响着中国的外交政策,它们是毛泽东外交思想形成的国内背景。

(三)理论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外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捍卫新生政权,巩固来之不易的独立,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争取一个有利的和平的国际环境。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在认识和把握世界大势,处理中国与世界关系,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关系时,制定对外方针政策理论依据,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际战略观。

1. 马克思主义时代观。科学观察和分析时代特征,正确估量与把握世界主题,是正确制定内外政策的基础和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时代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他们曾将生产方式的变更和阶级关系的分析法作为划分时代的依据,认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的基础”^①,并指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成了社会上两个起决定作用的阶级”^②,它们的矛盾和斗争是这个时代的主题。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逐步发展到垄断阶段后,列宁提出了帝国主义时代的概念,认为在这一时代,世界被区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垄断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引起帝国主义之间实力发生变化。帝国主义国家为了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兼并弱小民族、争夺世界霸权,发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帝国主义时代世界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

2. 马克思主义国际格局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阶级、民族的视角观察国际格局。马克思、恩格斯将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看作是阶级及其代理人,认为阶级是最根本的国际关系行为体,国家、政党、集团和政治家都是特定阶级的代言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国际政治的主要行为体。马克思、恩格斯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列宁将世界格局划分为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认为帝国主义、被压迫民族和殖民地民族超越两大国际性阶级成为国际政治最主要的行为体^③;赞同共产国际用“全世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80、306页。

^③ 《列宁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232—233页。

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修订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①。

3. 马克思主义战争和平观。战争与和平问题是国际关系的基本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战争根源及性质有深入的分析。马克思认为，战争与和平问题都有深刻的经济根源和阶级性质，都是国内政治的国际延续。私有制是产生战争的根源，战争将随着私有制的消亡而消亡。战争的性质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革命性的、解放性的、防御性的和防卫的战争是正义战争，而掠夺性的、侵略性的、争霸性的和侵犯他国主权与利益的战争是非正义战争。列宁认为，现代战争根源在于帝国主义，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策的内容，而这种政策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战争，即争夺世界霸权和扼杀各弱小民族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②。帝国主义时代的和平，区分为帝国主义的和平、人民群众的和平，以及社会民主党的和平。帝国主义的和平，“不可避免地只会是两次战争之间的‘喘息’”^③，而“民主的”和平，“实践上就是欺骗人民群众”^④。只有社会民主党的和平同社会主义革命相联，才是真正的和平。因为“摆脱战争惨祸的唯一途径就是开展争取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战争必然引起世界革命，革命制止战争。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国际政治观有着丰富的内涵，这里仅列举了具有代表性的三个方面。

二、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本内容

毛泽东外交思想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有着极其丰富的内容。其基本内容如下：

（一）独立自主

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是自抗日战争时期起就产生和发展的。当时这一思想有对内对外两方面的内容。对内主张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坚持中国共产党的独立自主地位，维护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利益，坚持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地位，不能无原则地接受国民党提出的条件，不能把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完全交给国民党。毛泽东在这一时期尤其批评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认为这可能导致中国共产党丧失独立性，对党来说是很危险的。对外，“表现在中国共产党人既反对国民党完全依赖于英美帝国主义的政策，也反对中国共产党内部盲目服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做法，主张独立自主，在不丧失领土和主权的前提下，和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国家订立反侵略同盟及抗日军事互助协定。”^⑤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将独立自主确立为中国外交的基本方针。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在审改《中共中央关于外交问题的指示稿》时，提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项，不允许任何外国及联合国干涉中国内政。因为中国是独立国家，中国境内之事，应由中国人民及人民的政府自己解决。如有外国人提到外国政府调解中国内战等事，应完全拒绝之。”^⑥1949年9月，毛泽东的独立自主外交思想被吸纳到《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成为新中国外交的指导方针。

毛泽东独立自主外交思想的基本内容是，争取和捍卫中国真正独立、平等的地位，保障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独立自主地制定和执行国家的内外政策，不容许任何外国干涉中国的内政。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就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致力于独立探索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新中国前夕确立的“一边倒”外交方针，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据对新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国内环

① 《列宁全集》第4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26页。

②③④ 《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3—410、431、297页。

⑤ 高继文：《论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2期。

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第78页。

境的把握,独立自主作出的决策。20 世纪 50 年代末 60 年代初,当苏联企图干涉中国主权和内政时,毛泽东就逐渐与苏联拉开了距离。20 世纪 70 年代,由于中国与苏联的矛盾上升,为应对苏联对中国安全利益的威胁,中国与美国改善了关系,但这时中国也没有放弃反对美国霸权主义方针,与美国保持一定的距离。毛泽东独立自主外交思想把反对苏美两个大国对中国的干涉和控制放在首位。

(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

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①。毛泽东这一理念的基本内涵是:首先,强调爱国主义,主要表现是维护民族的利益、国家的主权和独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意识,他们把维护全民族的利益看作是自己神圣的职责,始终不渝地为中国的民族利益和民族尊严而斗争。因此,维护民族的利益、国家的主权与独立成为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外交战略目标。为此,“中国一方面强调任何外国必须尊重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平等互利的条件下同中国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另一方面特别重视建立中国自己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建设中国的现代化,并坚持‘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个融经济上自立自和政治上维护国家主权为一体的方针。”^②其次,中国外交中的爱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是与国际主义相结合的爱国主义。强调发扬国际主义精神,对人类作出较大贡献。国际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国际无产阶级团结互助思想的继承与发展。毛泽东外交思想中的国际主义主要表现为,在国际上主持公平正义,说公道话,办公道事,反对以大凌小,以强欺弱的强权政治。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原则,要求一国首先要坚决维护本国的独立和主权不受任何侵犯,积极推进本国发展,同时,还要求支持世界人民的正义事业,力所能及地给予其他发展中国家以政治、经济等援助。坚持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还必须反对各种形式的大国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不允许假借国际主义的名义,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或者实行所谓革命输出,也要反对假借爱国主义的名义,不去履行其有能力和可以承担的国际义务。

(三)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思想是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重要内容,也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本内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毛泽东和平共处外交思想的基本内涵。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明确指出,中国的外交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③。1953 年 12 月,周恩来在会见中国和印度政府谈判代表团时将这些原则概括为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④,并倡议将它们作为处理中印关系的原则。按照这一原则,1954 年,中国政府同印度政府妥善解决了印度在中国西藏地区的商务、交通和人员交流问题,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由此成为中印两国发展友好合作关系的基本准则。在 1955 年万隆会议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充实,并成为指导亚非国家团结合作的指导原则。此后不久,毛泽东明确提出“应把五项原则扩展到所有国家的关系中去”^⑤。他认为,“这五项原则是适合我国的情况的,我国需要长期的和平环境。五项原则也是适合你们国家的情况的,适合亚洲、非洲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的。对我们来说,稳定比较好,不仅是国际上要稳定,而且国内也要稳定。”^⑥在中国的推动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逐步发展成为国际关系普遍公认的准则。

毛泽东和平共处思想的核心:一是强调国家的主权独立,倡导各国间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年,第 520 页。

② 高继文:《论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外交思想》,《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 年第 2 期。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1921—1949)》第二十五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年,第 352 页。

④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5)》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333 页。

⑤⑥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第 165、186—187 页。

强调“一国的国内纠纷，由这个国家自己管，别国不得过问，也不得利用这种国内纠纷。一个国家只能承认别国的人民自己选择的政府。……一个国家也只能有一个政府……那是这个国家的事，我们不管；中国将来是否会有另外一个政府，那是中国的事，别国也不能管”^①。也就是说，选择何种政治制度、发展道路是各国人民自己的事，任何国家无权干涉，任何国家不应该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别国身上。二是强调国家平等权，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应平等相待。1954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外宾谈话时强调：“国家不应该分大小。我们反对大国有特别的权利，因为这样就把大国和小国放在不平等的地位。大国高一级，小国低一级，这是帝国主义的理论。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小，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它同另外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也应该是完全平等的。”^②三是强调发展权，和平相处，互不侵犯，为国际社会的共同发展创造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在冷战时期强权政治盛行的年代里，毛泽东这种以维护主权利益为核心的和平共处思想的实质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尊重各国人民自己的命运，尊重各国独立自主地选择国家发展道路的权利^③。

（四）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建立反帝反霸统一战线的思想也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本内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障世界的永久和平^④作为中国对外工作的根本目标。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鉴于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势力较为猖獗，维护世界和平非一国所能为，中国强调必须联合全世界一切革命力量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组成反帝反霸统一战线。在具体实践中，中国政府依据实际情况把不同国家划分为不同类型，采取有针对性的方针，从而找到可以团结和依靠的力量。其目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广泛的反帝反霸国际统一战线。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建立广泛反帝反霸国际统一战线理念贯穿于毛泽东外交决策的始终。“首先是联合苏联、各人民民主国家和各被压迫民族”^⑤，反对美国等国的帝国主义。此后，随着国际局势的发展变化，毛泽东对国际战略力量分析不断提出新的认识和判断，借以寻求可以团结的力量。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中国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国际形势和对外关系，1957年2月，毛泽东指出，“世界上有三种力量在斗争，一种叫社会主义，一种叫民族独立运动，一种叫帝国主义。第二种力量在某些问题上，如和平问题，反对帝国主义问题，可以跟我们合作。”^⑥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在中国北部边境不断增强的军事部署及对中国边境地区的袭扰，对中国安全构成严重挑战。美国发动对越南的战争，对中国南部边境构成威胁。为应对美国、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对中国安全构成的威胁，毛泽东提出“两个中间地带”思想，即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在“两个中间地带”中的国家都是中国反霸可以团结和争取的力量。

中苏关系破裂后，苏联在战略上打压中国，在中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及周边地区的战略部署，使中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而美国为了应对苏联在全球的快速扩张，改变与苏联竞争中的不利局面，向中国发出缓和两国关系的信号，着手调整对华政策。中国领导人抓住这一契机，调整与两个超级大国同时为敌的战略。1973年2月和1974年1月，毛泽东先后会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和日本外务大臣大平正芳时，提出了“一条线”及“一大片”的思想。他指出，“可以‘搞一条横线’，即把美国、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欧洲团结起来。也要团结一大片的第三世界。”^⑦为共同对付苏联的扩张，对外明确提出了“一条线”和“一大片”的联合反霸战略。在此基础上，1974年2月22日，毛泽东在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指出：“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是第二世界。咱们是第三世界。”“第三世界人口众多。亚洲除了日本，都是

①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81、191页。

③ 王巧荣：《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及其外交思想》，《第六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第603页。

④⑤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第4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三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85页。

⑦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69、518页。

第三世界。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拉丁美洲也是第三世界。”^①毛泽东对“三个世界”的划分是其国际统一战线思想的具体体现。“它明确告诉我们，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推行霸权主义，危害世界和平，从而成为国际斗争的主要敌人，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受压迫最重，受剥削最深，是反帝反霸的主力军，第二世界与超级大国有密切联系，又有尖锐矛盾，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世界发展的积极因素，从而是可以联合的重要力量。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加强同第三世界的团结与合作，成为中国外交工作的基本立足点。”^②

(五) 战略上藐视敌对力量，策略上善于和敢于斗争

作为一个战略家，毛泽东在面临国际上较为强大的力量威胁和遏制时，有一种敢于进行斗争，不怕鬼、不信邪，敢于胜利的英雄气概。他强调“在战略上，在全体上，藐视敌人，敢于同他们斗争，敢于夺取胜利；同时，又要在战术上，在策略上，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斗争问题上，重视敌人，采取谨慎态度，讲究斗争艺术，根据不同的时间、地点和条件，采取适当的斗争形式，以便一步一步的孤立敌人和消灭敌人。”^③毛泽东的“纸老虎”论，是毛泽东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策略思想的主要体现。

在民主革命时期，在总结人民群众斗争经验的基础上，为提振信心，1946年8月6日，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④的著名论断。20世纪50年代，在美国侵略战争的恫吓面前，毛泽东始终坚持“纸老虎”论，1955年4月，他在同英国客人谈话时指出，美国可怕又不可怕，“可以这样说，战争如果打起来，在战争初期和表现形式上，它可能是铁老虎，可是到后来便会成为纸老虎。因为美帝国主义不得人心，人民反对它，它只能是在铁老虎的形式中包含纸老虎的实质。”^⑤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时，对“纸老虎”的论断作了重要的补充，他在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同时，对这一外交战略作了具体的解释。他指出：“为了同敌人作斗争，我们在一个长时间内形成了一个概念，就是说，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说在整体上我们一定要藐视他，在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上我们一定要重视他。”^⑥1958年12月，毛泽东更完整地讲到了他的“纸老虎”论。这一次他从哲学的角度进行了解释，他指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的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⑦。

毛泽东坚信，任何强大的国家任何强大的敌对力量，都会经历一个从强盛到衰弱的过程，这是历史规律。对此，人们可以通过采取各种方法，加速这一转化过程。当中苏两国矛盾公开化，两国关系从友好转为敌对时，毛泽东的“纸老虎”不仅指美国，而且也用在苏联身上。1964年1月，毛泽东会见法国客人时指出，“美国是只纸老虎，你们不要相信它，一戳就穿了的。苏联也是只纸老虎，我们不信它那一套，我不迷信。……大国来控制我们国家，那不行。”^⑧

毛泽东外交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关于世界大势、国际战略力量格局以及中国与世界关系系统化的理论成果，也是对这一时期新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所积累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第521页。

② 荔学良：《浅论毛泽东外交思想》，引自毛世信：《毛泽东思想专题研究》，西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242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军事文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388页。

④⑤⑧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第61、206、521页。

⑥⑦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28、455—456页。

三、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时代价值

毛泽东外交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指南，也是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对于维护此一时期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深入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为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毛泽东外交思想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外交理论成就的集中体现。独立自主、和平共处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是新中国外交的基石。习近平外交思想，既坚持和继承了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基本内核，又依据新时代中国面临的深刻复杂的国际国内局势，对毛泽东外交思想进行了创新发展。独立自主外交方针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内容。新时代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方针具有广阔的世界视野，它不仅立足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更致力于促进世界的公平正义，“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①。它坚持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精神，“始终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坚决反对一切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冷战思维，反对干涉别国内政，反对搞双重标准。”^②

总的来讲，新时代中国独立自主方针要求中国要深入推进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我们既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又要使这种方针体现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基本特点，体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社会制度、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核心理念，是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创新发展。该理念倡导推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主张国家之间相互尊重、平等协商，构建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提倡以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安全的总体安全观，应对经济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面临的复杂多变的安全问题；重视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这些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中国综合实力及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背景下，为应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为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所提出的目标追求，它创新发展了中国倡导的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设公正合理新秩序的理念，使新时代中国关于国际新秩序的理念由高度重视领土、主权等高政治领域的问题，向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关注的各领域全球性问题拓展，彰显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及大国担当。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的“纸老虎”论断在中国同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政策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成为新中国外交的优良传统和鲜明特色。进入新时代后，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发展的环境也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习近平外交思想倡导的勇于担当，敢于斗争的精神，要求中国外交工作者为民族担当，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要求他们为世界担当，坚定捍卫公平正义；勇于进行具有新时代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如“面对来自外部的各种围堵、打压、捣乱、颠覆活动，必须发扬不信邪、不怕鬼的精神，同企图颠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企图迟滞甚至阻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一切势力斗争到底”^③。

（二）毛泽东外交思想的实践留下的宝贵经验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和政府依据对国际国内局势发展变化及我国外交工作面临的主要挑战适时调整外交战略，先后实施“一边倒”、“反帝反修”和“一条线”等战略，捍卫了新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使中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得以恢复，奠定了中国大国的地位。毛泽东外交思想实践为新时代深入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留下了宝贵经验：

①③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60、56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60页。

1. 坚持科学把握国际国内形势。科学分析国际国内形势的新变化和发展趋势,深刻把握时代发展潮流,是确定一国外交政策的依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把握国际局势。如前所述,他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国际观的基础上,对国际格局、世界大势作出独具特色的判断,如关于国际格局,在坚持两极格局判断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两个中间地带”、“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又如关于世界局势,新中国成立之初,基于以苏联为首的世界和平民主阵线力量的壮大,世界各国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人民运动和帝国主义国家间矛盾的发展,毛泽东认为“目前的国际情况对我们是有利的”,“新的世界战争是可以制止的”^①。1957年11月,毛泽东强调“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②。到20世纪60年代,中国领导人又做出“目前全世界正在经历着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过程”等^③,据此制定并适时调整中国的外交方针政策,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国家利益。新时代中国面临的世界大势更趋复杂多变,更需要我们时刻保持清醒头脑,科学研判国际局势的新特点、新变化,以及世界大势的发展方向,作出合乎时代特点的科学决策。

2. 坚持将维护国家利益放在首位。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是一国外交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在毛泽东外交思想中,贯穿始终的正是国家利益。毛泽东对中国国家利益的判断符合中国客观实际。在实践中,毛泽东根据国际国内局势的变化也不断调整他对国家利益的判断,以更好地反映中国国家利益的现实^④。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安全发展两件大事,客观判断国家利益、国家利益的各个方面在国家对外战略中的优先次序及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和方式,是外交决策的关键。

3. 坚持外交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是外交的使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冷战格局下,中国先是面临来自美国的全面制裁、遏制和对抗,后又遭受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分别从南北两面的威胁,国家生存和安全利益受到严峻挑战,中国外交在捍卫中国安全利益,争取获得更多国家的承认,促进中国国际影响力、国际地位逐渐提高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4. 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独立自主是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也是中国外交的基石。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在独立自主外交方针的指引下,中国政府“坚定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尊严,支持和援助世界被压迫民族解放事业、新独立国家建设事业和各国人民正义斗争,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彻底结束了旧中国的屈辱外交。”^⑤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恢复后,中国政府积极参与联合国及附属机构的活动,坚持公平正义,致力于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因而成为中国外交的基石。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国政府继承和发展独立自主外交的传统,进一步宣告:“中国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坚持独立自主,对一切国际问题都根据其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态度和对策。中国判断是非的标准,就是看它是否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世界经济繁荣。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也决不同它们任何一方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⑥如前所述,进入新时代后,中国政府在新的形势下一如既往地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5. 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外交的目的是维护和实现国家利益。作为东方文明大国,自新中国成立时起,中国就没有把眼光局限在本国的范畴内,始终坚持把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与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结合起来,把维护世界和平作为中国外交的宗旨。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是当代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为维护世界和平,中国不遗余力地反对一切形式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行径。

20世纪50、60年代,中国通过抗美援朝、援越抗法及援越抗美,有效地遏止了西方国家在亚太地区的侵略行径。中国不仅坚定地反对霸权主义,而且明确承诺不称霸。1974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

①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外交文选》,第135、291页。

③ 《周总理说:帝国主义是不打不倒的,修正主义是不斗不垮的——世界人民反美反修斗争从胜利走向胜利》,《人民日报》,1965年11月30日,第1版。

④ 王巧荣:《毛泽东的国家利益观及其外交思想》,《第六届国史学术年会论文集》,第605页。

⑤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第11—12页。

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6年,第962页。

在特别联大上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①“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那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②据此，1975年5月，周恩来在会见泰国总理克立·巴莫时指出，“我们决定了一条原则，不称霸。不管中国将来如何发达、强大。”“无论如何我们不做超级大国，现在不做，将来也不做。”^③新中国关于永远不称霸、不做超级大国的庄严声明，为新中国外交工作的健康发展确立了一个必须遵守的重要规范。中国坚定的反帝、反霸、不称霸立场，充分彰显了中国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世界情怀。

结 语

毛泽东外交思想是毛泽东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与建设实践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近代以来中国外交理念与实践经验教训是毛泽东外交思想形成的历史背景，战后国际局势新特点以及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和建设时期对外工作的实践经验是其形成的现实背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国际战略观是其形成的理论基础。毛泽东外交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独立自主、和平共处、反帝反霸国际统一战线是其主要内容。

毛泽东外交思想为新时代中国外交奠定了理论基础。习近平外交思想继承和创新发展了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等毛泽东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新时代中国独立自主外交方针具有广阔的世界视野，它不仅立足于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更致力于促进世界的公平正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使新时代中国关于国际新秩序的理念由高度重视以领土、主权为核心的高政治领域，向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关注的各领域全球性问题拓展，彰显了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及大国担当。科学把握国际国内形势，坚持将维护国家利益放在首位，坚持外交服务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坚持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等是毛泽东外交思想实践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

(责任编辑 武晓阳 责任校对 武晓阳 刘 伟)

On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Mao Zedong's Diplomatic Thought

WANG Qiaorong

(School of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a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Abstract: Mao Zedong's diplomatic thought was born and develop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CPC) with Comrade Mao Zedong as the main representative in leading the Chinese people's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practice. Independence, peaceful coexistence, the combination of patriotism and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n international united front against imperialism and hegemony are the basic contents of Mao Zedong's diplomatic thought. Among them, independence and peaceful coexistence as its core contents has laid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China diplomacy in the new era. Accurately grasping the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situations, objectively understanding national interests, and adhering to the principle of diplomacy serving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the country are the valuable experience left by the practice of Mao Zedong's diplomatic thought.

Keywords: Mao Zedong; independence; peaceful coexistence; anti-imperialism and hegemony; new era

① 邓小平在讲话中把“超级大国”定义为：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的帝国主义国家。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文集(1949—1974)》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55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494页。